



经济学方法论

商务印书馆

〔英〕马克·布劳格著



中财 B0023527

经济学方法论

〔英〕马克·布劳格 著

石士钧 译

马清槐 校

中央财经学院图书馆藏书

总号 403087

书号

商务印书馆

1992年·北京

Mark Blaug
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Or how economists expla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根据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译出

JINGJIXUE FANGFALUN

经济学方法论

〔英〕马克·布劳格 著

石士钧 译

马清槐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三河县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240-6/F·149

1992年10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236千

印数0-3 400册

印张10

定价：4.80元

译者前言

(一)

经济学方法论是一门有关经济理论分析中运用科学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规律或规则的学问。经济学有没有充实完善的方法论,不仅是其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而且是它能否得以顺利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这是因为,经济学在前进发展的过程中,当它对经济学方法论加以完善或革新时,就常常孕育着新的研究领域或新的理论内容的诞生,推动着经济科学的不断进步。反之,当研究和发展经济学方法论的问题被束之高阁的时候,最终必然严重地制约甚至阻碍经济学的发展。因此,经济学方法论作为经济科学发展演化的重要基础和必要的衡量尺度,它对经济学的重要意义不容忽视。应该认识到,经济学方法论是经济科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充分证实了这一点。自19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家们几乎没有中断过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探索和争论,其中较为突出的至少有这样几次:第一次是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著名的“方法论争”,这场由门格尔和施穆勒挑起的、以经济分析应采用抽象演绎法还是历史归纳法为中心内容的激烈论战,竟在奥地利学派与德国历史学派之间持续了近30年之久。第二次则是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一场所谓“方法论革命”。其时,投入产出分析、经济计量方法、博弈论、线性规划在经济学中先后得到应用,经验统计手段、制度结构分析等方法也获得长足进展,另外时点与时期、事前与事后一类长期的动态的研究方法和无差异曲线一类精细的

分析工具又相继问世。这些成果的取得大都与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与完善有着密切的关系,还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理论的蓬勃发展。第三次当推50年代初期那场重要而激烈的方法论争论,它涉及经济理论的现实性和检验标准等问题,对峙双方的主将就是大名鼎鼎的保罗·萨缪尔森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第四次又出现在8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这十余年来涌现的方法论或方法论史的著述犹如雨后春笋,是以往任何时代未曾有过的。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当今成绩卓著的经济学史家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托伦斯·哈奇森和马克·布劳格就是其中显著的例子,而沃伦·萨缪斯更是倾注心血,近年来一连主编了好几本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论文集。

不难看出,倘若我们对经济学方法论在西方经济学中的意义和作用掉以轻心,对它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也不甚了了,那么,我们就难以准确而深刻地把握和剖析西方经济理论,从而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偏差和错误。事实上,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有过深刻的教训。例如,由于以往不注意方法论问题,总是笼统地将一种学说的方法论或受它制约的若干研究方法与其理论内容或政策含义混为一谈,直接影响到我们评价西方经济学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且以本世纪初的一些经济学流派为例。其实从方法论角度来说,马歇尔的“综合”,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论,凡勃仑“整体主义”的制度—结构分析乃至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注重社会学因素的经济分析等,它们有的本身就是经济科学发展所需要的重要手段,有的则拥有积极的合理的方法论成分。可是我国学术界以往却因有关学说具有庸俗性质而过多地予以否定。又如,在一些不一定正确的方法论的支配下,仍可能产生若干较为正确的具体理论或见解。所谓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研究的是游离于社会和经济组织之外的鲁宾逊式的孤立人,可有关消费者行为的某些具体理论仍然较为可取。但我们以往对此也难以作出中肯的评价。可见,研究一下西方经

经济学的方法论,从方法论角度来透视所研究的学说内容,能够深化自己的理论认识,给予西方经济学以恰如其分的评判。

还应看到,要建立和发展指导我国四化建设的新的经济学,同样需要方法论的创新。没有方法论的创新,经济理论就难以取得全局性的重大突破。这种创新应该致力于发展能够反映经济学特点的具体方法论,应该积极发挥经济学方法论对于繁荣经济科学从而推动经济建设的导向功能,应该善于消化吸收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先进成果以形成独创性成果。在这样做时,当然要认真领会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重要的方法论见解,但同时也要认真分析和善于借鉴西方经济学方法论。这是因为,西方经济学尽管有着种种谬误,却也拥有不少应予以肯定的特点,如它向来有擅于吸收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来充实自己的传统,并且注重非经济因素(如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因素)给予经济生活的重要影响,注重经济运行机制一类较低理论层次的实用分析,注重创制富有特点的新颖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而这些特点自然体现在它们的方法论里,或者更确切地说,来自它们的方法论。很显然,这些对于我们的方法论创新不乏借鉴参考的意义。兰格、卡莱茨基和科尔奈这些成绩卓著的经济学家无疑是一面镜子。他们各自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共同特点,即他们都自觉地吸收和应用了西方经济学中可以借鉴的若干具体方法论。

此外,对外开放的环境和日益发展的学术交往也需要我国经济学者进一步熟悉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以促进彼此间的了解和交流。我国经济学者与西方经济学家在一些本可充分交流的领域里却往往难于进行广泛深入的学术对话,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彼此的经济方法论差异太大,颇有各讲各的意味。譬如,在西方经济学界,无论是流行的教科书还是专业学术论文,抑或专门的经济

学史著作,无一不广泛融合了现代科学哲学(即科学方法论)的众多成果。对于诸如库恩的常规科学、革命与危机的关系、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一类科学哲学的术语,西方经济学者们熟识得如同“供给”和“需求”一样。同样,他们谈论凯恩斯经济学的革命与危机以及对它的再革命,一般也都是依据科学哲学的含义来展开的,与我国有些学者习惯于纯粹从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解释这些问题相去甚远。可是我们常常不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之所以如此,无非是我们对有关科学哲学知识一般还知之不多,有些人甚至感到生疏或一无所知,更谈不上吸收其优秀成果来充实我们的经济学方法论,来深化我们的经济理论分析。这样一来,且不论别的,就连准确理解和把握西方经济学家的见解和思想都会大打折扣。这是绝不能等闲视之的。诚然,我们必须正视和认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谬误和缺陷,在这方面尚有不少工作要做。不过,应用现代科学哲学来说明经济理论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所蕴含的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同样应当受到我们的积极肯定。更何况,在一定意义上,科学哲学还是在方法论方面沟通我们与西方经济学者之间学术对话的一座桥梁。很显然,如果我国经济学者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继续停留在那种不甚了了或者一知半解的状况,要紧扣改革开放的时代脉搏,无异于是一句空话。

正是鉴于上述基本的理由(自然还有一些其他理由),我们翻译出版了这本《经济学方法论》,以期引起经济学同行们更多地关注和研究西方经济学方法论问题,并为发展和完善我们自己的经济学方法论贡献出创造性的成果。

(二)

本书作者马克·布劳格(1927—)是著名的经济史家、经济学方法论家和教育经济学家。他毕业于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

并获哲学博士学位。他曾先后在美国的耶鲁大学和英国的伦敦大学任教，还较长时间担任了伦敦大学教育研究所的教育经济学教授，现为伦敦大学名誉教授和白金汉大学顾问。

布劳格教授的著述甚丰，除了发表过大量颇具见地的学术论文外，还出版过不少有较大影响的著作或辞典，如：《教育经济学导论》(1972年)；《李嘉图经济学》(1973年)；《剑桥革命：成功抑或失败？》(1975年)；《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评价》(1980年)；《重要经济学家辞典》(1983年，与保罗·斯特奇斯合编)；《凯恩斯之前的伟大经济学家》(1984年)；《凯恩斯以来的伟大经济学家》(1985年)等。

马克·布劳格因对经济学史工作做出很大的成绩而在西方经济学界极负盛名。他热情地致力于研究、阐发、评价经济学家们的学术思想及其著作，撰写出数目可观且影响甚大的文章、辞典和传记，还提出了不少独具一格的学术见解。特别是他精心著述的《经济理论的回顾》(1962年)一书，篇幅浩大，视角独特，内容丰厚，阐述精到，受到了西方经济学界的普遍赞誉和推崇，甚至被视为一部经典式的经济学史著作，目前已出了第四版。在我们看来，该书确实是第二次大战以来一部不可多得的西方经济学史著作。同时，布劳格作为一名杰出的经济学方法论家，也享有相当高的声誉。这不仅是因为他十分关注经济学方法论问题(例如，《经济理论的回顾》一书就专辟了第16章即最后一章来较深入地探讨经济学方法论的各方面问题)，还经常从方法论角度来透视所考察的种种经济学说，从而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丰富和完善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更在于他的代表作《经济学方法论》(1980年)一书在战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发展历史上所具有的突出地位。就该书的理论容量与其篇幅相比较而言，它看起来只是一本带有概论性质的著作。然而，它对将近半个世纪中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诸多成果作了系统而深层的总结，并且就一系列方法论观点阐发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加之全

书体系完整、内容全面、视野宽广，自然不失为一部经济学方法论力作。所以，尽管该书的某些论述和见解受到异议和批评，人们依然公认其为战后少见的经济学方法论佳作。因此，当我们向国内读者介绍西方的经济学方法论著作时，首先选择这样一位学者所撰的这部力作，无疑是比较恰当的。

必须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经济学者们对经济学方法论的界说和概括，基本上存在着两种大相径庭的看法。一种比较普遍流行的主张是，经济学方法论无非是将现代科学哲学应用于经济学，这就是本书作者的基本立论。按照这种主张，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主要就是依据现代科学哲学的重要理论来探究经济学家的思维结构和分析型式，例如这些年大多是围绕“范式”、“证伪主义”、“科学研究纲领”等方法论观点来展开的。这种研究具有很强的哲学意味和较高的抽象程度，可较少涉及反映经济学本身特性的具体的方法论规则，有的人甚至对研究具体的方法论规则采取冷漠的态度。另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则同经济学本身的特性和进展密切相结合，特别注重经济研究过程以及经济分析方法中的方法论特点，因而显得比较具体实际。例如，在他们看来，诸如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投入产出经济学、统计研究法（包括概率分析、时间系列分析、信息技术等）和制度分析法的问世和进步，都是经济学方法论的重要发展。然而这类研究的理论抽象力又明显逊于前者。此外，有些日本经济学家（如宇野、大内力等）致力于经济学方法论的研讨，又是同所谓的“重新整理《资本论》”混杂在一起的，他们的见解自然与上述两种主张风马牛不相及。显然，西方学者对经济学方法论的理解和阐述尚属见仁见智，并未形成完全一致的共识。因此，译者感到有必要提醒一下，读者阅完本书后，能够清晰地概览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历史和现状，可以扼要地了解种种普遍流行的方法论见解，但还不可说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

所有重要见解已一览无余，更不要将作者的个人看法与已有定评的重要论点张冠李戴。

本书主要有序言和正文四编十五章，其体系结构和基本内容简述如下：

“序言”主要阐述了三个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经济学方法论的定义和范围。作者明确指出，它就是科学哲学对经济学的应用。第二，全书体系结构的安排和任务。第三，经济学方法论的作用及其应用的教训。他强调，经济学家的错误在于没有实行自己所鼓吹的方法论。

第一编是对现代科学哲学成果的简要考察。在第一章里，作者从“公认的观点”开始讲起，一直论述到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并将它当作科学哲学新旧观点的分水岭。第二章则围绕关于证伪主义的争论，先后评述了库恩的范式、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费耶拉本德的无政府主义以及方法论一元论等学说，这些学说实际上已程度不等地成为许多西方学者讨论经济学方法论的重要指导原则。

第二编概述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在作者看来，真正的经济学方法论原理首先产生于西尼尔和约·穆勒的著作里，而19世纪的英国方法论家以及罗宾斯和现代奥地利学派都是证实主义者，主张经济学是一门把真实的正确的前提或假说作为基础的科学，书中称之为西尼尔—穆勒—凯尔恩斯传统。这是第三章论述的主题，其中对穆勒的评述较为详尽，分别提到他在不同著作中的相异观点以及同其实际遵循的方法论之间的差别。第四章讨论了证伪主义对现代经济学家的重大影响。作者对托·哈奇森首先将证伪主义方法论引入经济学一事给予较高评价，并论述了操作主义、工具主义、描述主义、制度主义等方法论的特征及其与证伪主义方法论的关系，同时认为先验主义和实在论一类老的方法论观点

在这几十年里仍有一定市场。其结论是，现代经济学家经常宣扬证伪主义，但很少这样去做。然后，紧密联系福利经济学的逻辑地位来探讨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区分，构成了第五章的中心内容。在该章，作者抓住如何看待价值判断和社会科学能否摆脱它的问题，阐述了各种各样的有关见解，并具体评判了关于帕累托福利经济学实证性的争论。他的基本思想是，事实和估价在社会科学中的相互作用十分强大；要实现科学进步，必须努力增加事实的作用和减少估价的作用；因此，经济学的进步必须绝对优先考虑那些可证伪的经济理论的产生和检验工作。

第三编则是将前面所得的理论结论具体运用于一系列的案例研究。本编共选择九个案例(即第六至第十四章的九章)，它们是新古典研究纲领(即主流的正统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这些实例的目的在于阐明一些方法论教训，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来透视新古典经济学的优劣之处，从而作出更准确的综合评价。

第六章讨论消费者行为理论，不过着重论述的是需求规律。本章较详尽地考察了需求理论的演进过程，从马歇尔阐发的需求规律一直讲到最新的兰开斯特的特性理论。第七章涉及厂商理论，主要是对传统理论与拉特西斯的新学说作方法论上的比较。第八章简要地阐述一般均衡理论的理论作用和实践意义，看来作者对此只给予了较低的评价。第九章名为“边际生产率理论”，实际上主要涉及分配理论中一种较新的学说，即希克斯的相对份额理论。传统的观点把收入分配理论当成一种要素定价理论，它被作者说成是一个没有经验内容的一般命题。第十章直接评论两个剑桥之争，但作者从自己所信奉的方法论出发，明确站在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一边。第十一章评述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赫克谢尔—奥林—萨缪尔森定理，认为该理论缺乏经验有效性，是受证伪主义影响最晚的经济学研究领域之一。第十二章对长达20余年

的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的争论作了别具一格的评说。作者认为货币主义经历过三个阶段，弗里德曼最后因工具主义方法论缺乏说服力而放弃了它。令人瞩目的是，他还指责这场争论虽则兴师动众、激烈异常，却没有意义。

同上述七个实例研究有所不同，第十三和十四两章分别论述的人力资本理论和新家庭经济学，是六、七十年代才逐渐形成的新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它们已被视作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内容，但尚未写进一般的经济学教科书。按照本书作者的观点，人力资本研究纲领具有巨大的研究潜力，但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它现在已表现出一些退步或“危机”的征兆。因此，它将会逐渐衰落，并可能被新的理论所淹没，而所谓的筛选性假说会成为这场“人力投资革命”的转折点。至于加里·贝克尔为代表的新家庭经济学，本书只局限于作某些挑战性的评论，以便读者形成自己的评价。

第四编即第十五章对本书作了概括性的理论总结。作者用明确的语言阐明了如下的重要论点。第一，经济学的中心目的是预测，而不只是解释。第二，经济学方法论能做的是提供接受或反对某种研究纲领的准则，以便帮助人们分清良莠，不过它无法确定那些相互抗衡的研究纲领究竟哪一个在未来最有用。第三，现代经济学之所以陷于危机，其关键性弱点在于不愿产生一种内容能明确经受反驳的理论，从而普遍不想使其理论与现实相一致。第四，具体而言，激进学派、现代奥地利学派、制度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用漂亮的借口来轻视证伪主义方法论，唯独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在强调理论服从经验检验的重要性，但他们未能严格按此行事。可以看出，本书作者不仅有较明显的资产阶级立场，而且还是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拥护者。

无庸讳言，对于那些缺乏科学哲学知识的读者来说，本书可能是部较难读的著作。而辨识和清理其中存有的谬误亦较费时，这

进一步加重了读者的负担。显然,初读本书决不会是轻松愉快的。但译者愿进一言,只要有耐心和勇气,你就能成功地读完全书,那时一种不枉此举的感受便会油然而生,因为你领略到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透视经济学原理的情趣和深邃,并从一系列的独到见解中大受启迪。不过为了节省时间或免走弯路,译者建议初读者可以首先力图搞懂搞清如下那些重要的理论内容,以便尽快掌握本书的主要脉络、基本思路和重要论点:

关于现代科学哲学,着重应搞清楚的是:什么叫证伪主义?它为什么是科学哲学新旧观点之间的分水岭?它与以后的新异端即库恩、拉卡托斯和费耶拉本德等人的学说有何联系和区别?此外,必须准确理解“范式”、“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一元论”等术语的含义,它们都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家常用的分析型式。

关于经济学方法论史,主要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它的主要演进过程,二是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区分和相互作用。就前者而言,大致情况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占优势的是证实主义,30年代以来的主流当推证伪主义,其他方法论或者站不住脚,或者仅为它的变种。后者是一个人们议论颇多的题目,本书主要是围绕经济学能否摆脱价值判断来阐述的,其中有些论述值得认真一读,如关于方法论判断、基本的与非基本的价值判断、可证伪性是衡量实证经济学的尺度以及评述福利经济学和看不见的手原理等方面的阐述。

关于新古典研究纲领的方法论评价,充满着作者的独特见解。必须指出,这些实例研究不是就经济学界争论不休的本质问题提供明确的答案,而只是为了指明这些争论都牵涉到经济学方法论。因此阅读这部分内容时,读者可先根据自己的兴趣有所选择。从具体的论述内容来看,关于需求理论的发展,关于传统厂商理论与拉特西斯新学说的比较,关于传统收入分配理论的评价,关于凯恩斯

主义与货币主义的争论，关于人力资本理论和新家庭经济学的发展前景的展望，都不失为全书比较精采、比较深刻的部分。

至于全书最后的结论一章，是最富作者个人见解的部分，其中对于诸经济学流派和诸重要理论的扼要评说应该一看。而作者最终得出的重要结论上面已作简述，这里就不再赘言。

(三)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已逐渐关注经济学方法论的有关问题，并陆续出现了一些专门的著作和论文。这是令人甚为高兴的。可是，这类研究的重要意义仍然需要人们有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它的研究规模和水平还有待迅速的扩大或提高。就评介西方经济学方法论这方面而言，有关著述还为数甚少，且一般来说质量也不太高。它们或者仅仅作些较零碎和较简略的述评，尚缺乏明确的逻辑主线和必要的广度或深度，或者几乎无视科学哲学对于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重要影响，似有不得要领之嫌。而从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如何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的这个基本目的来看，我国这类研究目前还收效甚微，显得可有可无。这表明，无论是评介西方经济学方法论，抑或完善和发展我们自己的经济学方法论，我国经济学者尚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必须坚定不移地扎扎实实地开展下去。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深入开展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呢？译者认为，至少以下这些理论问题是应当认真探讨和尽快解决的。

一、经济学方法论的内涵。什么叫经济学方法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以，尽管经济学者们都在使用“方法论”一词，但由于其内涵的歧义性，却产生了许多本无必要的令人困扰的争论和歧见，甚至直接削弱了方法论指导经济理论分析的现实作用。我国经济学界长期来对方法论实际上采取了一

种无所谓的态度,主要恐怕就是“方法论”一词缺乏明确的内涵和适用的范围所造成的。无庸赘言,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内涵形成一种大致的共识,实属必要。

在这样做时,我们应当力图避免那种习惯于夸大其内涵和范围的常见作法。值得强调的是,准确把握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经济哲学和经济学方法论这三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便是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指的是关于经济社会的一系列的信念。这些重要的信念支配着经济学者们思考、判断和解决有关经济问题的兴趣或方式,规定或制约着他们自己所遵循的经济学方法论的某些本质内容,还影响到他们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具体运用。但是,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并不就是经济学方法论本身,具有共同意识形态的经济学者却常常遵循着大不相同的方法论,而意识形态方面互相对立的人们仍可能在应用经济学方法论时存有某种或某些共通之处。经济哲学则一般被看作是经济学者们各自理论分析中体现出来的一般哲学思想或见解,它具有很高的抽象意味。所以,有的西方学者将其说成是哲学家与经济学家的兴趣和专长相交叉的研究领域,认为研究经济哲学旨在采取一种有用的方式把哲学上的思考与经济思考结合在一起,从而激发人们对经济生活形成新的思维,并使得经济生活更加易于理解和把握。由此可见,经济哲学可以算作是经济学方法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它毕竟没有包容经济学方法论的全部内涵,两者并不能等量齐观。把它们混为一谈的做法,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经济学方法论的相当部分内容是经济哲学所无法替代的。

二、经济学方法论的层次性。长期以来,人们始终囿于一种比较狭隘的观念,仅仅简单地把经济学方法论看成是一个没有层次性的单一概念。其结果是,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往往显得过于抽象笼统,既令人难于捉摸把握,又无助于经济理论的创新和

发展。苏联在这方面的教训是发人深思的。几十年来,苏联经济学界高度重视和自觉运用方法论可称蔚为风气,无论是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抑或评述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苏联学者几乎总用明确的语言和一定的篇幅阐明方法论问题。这无疑是值得赞许的。然而,可惜“方法论”在他们的心目中变成了一个抽象玄奥的哲学范畴,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并没有真正同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融为一体。这种传统的作法对我国学术界也有着较深刻的影响。

经济学方法论的层次,既包括最高层次的具有哲学意味的一般方法论,又包括那些反映着经济科学本身的性质和特点的具体方法论。例如,50年代初期关于理论假设的现实性问题的方法论争论主要就涉及前者,相反,借用物理学概念而发展起来的局部均衡论和一般均衡论、主张经济理论必须着眼于个人态度和行为或者集团行为而形成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或整体主义方法论,则属于层次较低的具体方法论。另外,方法论虽则不可与方法同日而语,彼此却有着密切的联系。具体地说,一种学说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总受到某种方法论的支配或制约。例如,只有信奉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学者,才可能创制和发展无差异曲线一类同个人行为紧密相关的研究方法或分析工具。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研究方法所体现的那些指导性规则仍是经济学方法论的有机部分。总之,只有树立经济学方法论应该分层次的思想,这种方法论研究才不至于陷入抽象空泛的议论,才会真正影响和推动经济科学的发展和进步。

三、经济学方法论的功能与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经济学界流行一种看法,认为专门讨论经济学方法论问题徒然在浪费时间和精力,或者标志着经济学在走下坡路。这样一味贬低经济学方法论的意义的见解,未免失之偏颇。且就80年代兴起的讨论经济学方法论的热潮而言,它固然同西方经济理论一度陷于

危机这一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事实上积极参与这类研究的西方学者们并没有都单纯地作如是观。他们当中不少人之所以热衷于探讨经济学方法论，有的是为了借以引入其他学科的成果（如认识心理学等）来更全面、更严格地检验经济理论，有的是因为将经济分析方法看作研究人类行为中唯一合理或富于成果的方法，有的是要从中总结科学哲学应该如何适用于经济学科的有益成果，有的则在于更透辟地追溯和剖析主要经济学说的来龙去脉，有的甚至意在寻觅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这表明，不少西方学者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功能与作用仍有着较清楚的认识和较高的评价。

在我们看来，经济学方法论的积极作用最主要表现为它具有独特的导向功能。方法论的这种导向功能，犹如建造高楼大厦的奠基层面，为经济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好似茫茫大海中的指路灯塔，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指引着前进的方向；仿佛温润松软的沃土，培育着经济学科新分支和新理论的萌生、成长和结果。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个人主义方法论在19世纪末的广泛传播，微观经济学中的诸多理论就很难在当时产生和深化；倘若不确立整体主义方法论，制度主义者一类经济学“异端”也不可能始终沿着“制度—结构”分析的道路行进；假使30年代并未发生“方法论革命”，计量经济学、投入产出经济学等新分支也绝对无法随即问世。同样，一种重要理论具有明显的缺陷或不足，又可能从其方法论上找到原因，即它是由方法论的先天不足或缺陷带来的。因此，十分重视经济学方法论的导向功能，深入探究它的种种具体表现，认真解决它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实际用处，应当成为我国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主旨和重点。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关系。同一般西方经济理论一样，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也具有科学性一面